

《永乐大典》地图考录

黄 燕 生

地图的测绘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记载，然而，传世作品多为明中晚期以后所出。宋元明初时期，尽管雕版印刷术已十分盛行，版刻地图已遍及各地，但历经数百年的板荡流离，现在所能见到的实物寥寥无几。特别是明初编绘的地图，除《洪武京城图志》尚存孤本外，几至罕见。而明初编纂的巨型类书《永乐大典》却引录并保存了众多绘制精细的宋元明初地图，弥补了自宋元版刻地图至明嘉靖间罗洪先《广舆图》问世这一阶段的空白，从而成为中国地图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随着古地图整理和研究的全面展开，这批久被忘却的珍贵地图资料正在受到人们的重新认识，日益显示出它们的特殊价值。

实际上，对《永乐大典》中地图的注意和利用，在清代中叶就开始了。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借供职全唐文馆之机，从《大典》中辑出《河南志图》（河南府地图中的历代城阙古迹部分）十四幅，复加文字标注和说明，以为撰作《唐两京城坊考》之资料；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书的《海国图志》中有一幅《元经世大典地里图》。据作者魏源称，这幅与传统地图全然不同的怪异的西域地图即“得自《永乐大典》。”由于《永乐大典》一直深藏秘府，得以观览者不多，而一些得见《大典》的官员又各有趣好，没能对方志图谱予以足够的重视。

《永乐大典》现存约四百余册，八百余卷，虽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但仍保存了一些古代地图。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方志地图，占绝大多数。历代修志都很重视舆图编绘，多于卷首列出本地境域、城池、古迹图，有的还辟有专卷图考。按《大典》凡例，历代方志均附见于各府、州、县地名下，“诸郡志书重见叠出，难于考究，今各依类，荟萃归一，就中区别同异。”《大典》征录地图，也依此体例，凡一地举列数种方志者，其地图亦渊源有自，并不相同，如梧州府、潮州府、河南府、南宁府、广州府条所附地图即出自不同的几部方志。有的是直录宋元旧志之图，有的是据旧图改绘而成。另一类是古代释经书中的插图，有《燕国分野之图》和《楚地指掌之图》两幅，均出自南宋程公说《春秋分纪》。由宋人编绘的历史沿革地图传于今者只有明刻《历代地理指掌图》。这两幅地图的绘制形式近似于《历代地理指掌图》，但更为精细，古今地名的标示也很清晰，对于考定宋代出现的各类《指掌图》和全面认识宋代版刻地图特点有一定参考价值。第三类是带有地图意味的方位示意图。如卷三五一八周五门条所引《陆氏礼象》中的《天子门》、《王城诸门》、《诸侯门》、《诸侯城诸门》及陈祥道《礼书》中的《天子五门》等图，卷七三九〇丧韵下所录《葵祭会要图》中的《周礼先王及昭穆左右图》、《周礼诸王兆域庶子以下从葬图》和《三礼兆域图》，卷七四五九至七四六一征录的许多丧制图，卷八一九九引录的一些墓穴图，卷一二〇七二中的《建安府学乡饮图》和《南康军学乡饮图》，卷一七〇八四庙韵引《存心录》中的四幅庙制图，卷二〇四二七中的《井田图》等。这些图虽然也标绘有地面景物名称，但多为古人理想中的仪礼规制，而非实测所得。严格说来，还难以划入地图范围。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这些设计图与实景的对照中考见古代的礼制及古人的著述风格和绘图特点。

从《大典》地图形制不一、面貌各异的特点可以看出，所绘

地图基本上能保持原貌。以影宋抄本《春秋分纪》与《大典》征录的是书两幅地图相校，也证明了这一点。传世宋元版刻地图中，原刻真迹很少，明清再版者往往与原本有着不少差异。如被认为是现存较早的一幅宋版《六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明崇祯年间再版时，一些标示景物地名的符号就与宋原刻本有了显著不同。因此，《永乐大典》中的宋元地图不仅丰富了古地图宝藏，而且在鉴别和判定这一阶段图绘特点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永乐大典》中的明代方志地图，都是洪武年间绘制的，有些还是某些地区最早的地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明初地图用以标示地名的某些地图符号，与宋元版刻地图和明中晚期地图，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大典》卷五一九九太原府阳泉、太原等县图以△标示坟墓，这与元人李好文所绘《长安志图》的绘法完全相同；该卷地图与卷九五六一河南府县地图皆用表示古城。同样的符号又出现在明嘉靖年间编纂的《广平府志》、《惟扬志》、《青州志》、《鄆陵志》、《仪真县志》、《宿州志》的地图中，似乎明人绘图，对于地名的标示，有着成文或不成文的统一规定。这些地图基本上都在四边四角注明四至八到，与志文中的里至相呼应。运用地图符号也较宋代地图规范，一些标示城池、社坛、桥梁、陵墓的图形已趋近于几何符号。我们知道，原始地图只是古人用直接绘画图象的方法再现自己所了解的地理环境。随着对自然现象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渐将某些地面景物轮廓加以概括和简化，于是出现了象形符号。从带有图画意味的标志中解脱出来，代之以抽象的几何符号，反映了人们概括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我们已经认识了根据朱思本《舆地图》增广而成的《广舆图》与唐贾耽《海内华夷图》和宋《禹迹图》在计里画方上的师承关系，但从宋代图碑和版刻地图上的象形图案过渡到列有众多几何符号的明中晚期地图，就图例的演进而论，似乎还缺少一个中间环节，而

《永乐大典》体现的明初制图学的进步，正是连结《华夷图》、《禹迹图》到《广舆图》、《皇明职方地图》的重要纽带。现将《大典》所存一百五十二幅方志地图和两幅楚、燕国历史地图逐次编录考订如下，以使有关学者能够进一步了解《大典》所录地图的概貌。

泸州地图（卷二二一七）

《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至二二二九叙泸州，共十三卷。今存前两卷，有图、建置沿革、分野、至到、城池、坊巷街道、乡都、风俗形胜、户口、田粮、土产、山川、官室十三目，自官制以下十二目佚失。卷首列地图五幅，其中具名者四幅，即《泸州之图》、《江安县图》、《纳溪县图》、《合江县图》。第二幅无题，据内容看，应是《泸州图》（不含属县）。五图均注明取位上南下北，左西右东，实取位上北下南。图的四边、四角留有标四至八到的边框，但无文字，大约与图的南北方向标反有关。山峰写实，河流绘双线，地名一律圈以单线长方框。除首幅《泸州之图》标绘地名景物较多，诸县图都很简略。《江安县图》、《合江县图》都只标有地名六个，《纳溪县图》只标三个。

泸州在宋属潼川府路，入元辖于四川等处行省重庆路。明洪武六年（1373）隶四川行省，洪武九年（1376）直隶四川布政司。南宋时辖四县，元至元二十年（1283）并泸川县入泸州，此后至明，皆辖三县。与属县图所列相合。按《明史·地理志》：“旧治在州东茜草坝，洪武中徙此。城西有宝山，西南有方山。”也与图中所绘城池位置相符。又《泸州之图》所绘袞绣堂、四香堂、白塔、德隆桥、曹操庙等俱不见官室目所引宋《郡县志》、《江阳谱》、元《江阳续谱》，而上述诸书所言楼亭寺庙，亦不见载地图之上。图当出自明《图经志》。考《大典》述诸府州，每引

《图经志》，这种《图经志》似唐宋以来逢闰贡图之例，即将本地形势绘图进呈，并附注建置、户口、田土、贡赋、职官、古迹、风俗、山川等说明。现存《永乐大典》泸州二卷，于建置沿革、郡名、分野、至到、风俗形胜、户口、田粮、土产、山川等目引述《图经志》，而于城池、坊巷街道、乡都、桥、渡、园、宫室诸目引述《江阳谱》等书，说明编纂《大典》时，尚无明州志纂成，故选取了呈递本《图经志》中的地图。

湖州府地图（卷二二七五）

《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五至二二九二述湖州府，共十八卷，分三十目。今存前三卷，即图至官制十九目，公廨以下十一目佚失。所列地图十一幅，均无标题。据内容分析，有《府境图》、《府城图》、《府治图》、《六县总图》、《太湖南岸图》、《乌程县图》、《归安县图》、《长兴县图》、《武康县图》、《德清县图》、《安吉县图》。

湖州在宋属两浙路，辖六县。入元属江浙行省，改湖州路，领一司五县一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归附明朝后升府，仍辖六县。《大典》卷二二七五湖州府题下注明亲领乌程、归安、安吉、德清、武康、长兴六县，为明洪武间建置。以存卷所引《吴兴续志》与图对照，也基本相合。如城池目引《吴兴续志》述洪武间所定湖州府城五个水门、五个旱门的名称和位置，与《府城图》所示一一对应。由此可见，这些地图应是明初纂修的《吴兴续志》的内容之一。

诸图中，只《六县总图》取位上南下北，余皆取位上北下南。《府境图》与诸县图还于图的四边、四角注出至到。地图绘制精美，很有特色。其一，地形地貌的描绘准确、仔细，不仅河流的曲折、湖泊的形状均能如实地绘写，对于纵横交错的道路及港渚

密布的太湖南岸地形也都细致地描出，清晰可观。其二，描绘城池，不是像宋元方志地图那样仅画出一个矩形，而是按照实际形状绘出，与《洪武京城图志》很相似。一些有月城的城门也依样画出。最为突出的是《府城图》的东南部分，以俯瞰图的形式绘地面景物，在现存古地图中十分罕见。其三，各图虽未绘境界线，但运用了虚实对照的方法区别各自的辖域。如倚郭乌程、归安二县地图，均只标绘本县的地形地名，而将邻县空成一片，只标其县名，使观图者对该县辖区一目了然。这种虚实相映的行政区划图的绘制法至今仍很常见。其四，湖州府地图的地名标示也有其特点：《府境图》标示自然景物如山，水、池、湖、渚、漾的名称，都不加边框，而对人为设置的县、乡、铺、局、司的名称，则加以各种区别式的字框，如回、田、日、口等。总之，这十一幅湖州府地图不仅在《永乐大典》诸地图中可称佳品，就是在现存宋元明地图中，亦是上乘之作。

梧州府地图（卷二三三七）

《永乐大典》卷二三三七至二三四四述梧州府，共八卷，分为二十目。今皆传世。

卷首列图二十一，有《苍梧境图》、《府城图》、《梧州府治》、《苍梧县治》、《岑溪县境》、《岑溪县治》、《藤州境图》、《藤州城图》、《藤州治图》、《容州境图》、《容州治图》、《怀集县境图》（半页）、《怀集县治图》（半页）、《郁林州郡境图》、《郁林州郡城图》、《北流县图》、《陆川县图》、《博白县境图》、《博白县城图》、《兴业县境图》、《兴业县城图》。从所标图名看，很不统一，有称图者，也有不称图者。有分境、城各为图者，也有并为一图者。所列州县与卷首梧州府题下标亲领五县（苍梧、藤县、岑溪、容县、怀集）也不相

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当时征录到的旧志的辖域异于明初区域造成的。据统计，《大典》梧州府八卷中，引录志书有《苍梧志》（四十六条）、《古藤志》（六十一条）、《梧州府志》（七十一条）、《容州志》（五十四条）、《容县志》（二条）、《郁林志》（七十四条）、《昭潭志》（二十条）。这些方志多为明初据宋元旧志增改而成。如《苍梧志》成于洪武元年（1368），序称“因其旧编，略加校定，缺者补之，讹者正之。”在明显出自该志的《梧州府治》图中，还留有“梧州路”等元代官署名称。考梧州府设于明洪武元年，时领苍梧县、藤州、容州、郁林州。洪武十年（1377），降藤、容二州为县，又割平乐府之怀集县来属，加上原属藤州的岑溪县，共五县一州（梧州府题下只注五县，而建置沿革中明确记载了郁林州及所辖博白、北流、陆川、兴业四县）。编修《永乐大典》时，未能征集到反映洪武十年以后建置的地图，故沿用旧志之图，造成称谓和辖域与卷中所述的不一致。为明确各州县辖区方志与上述二十一幅地图的关系，特列表如下：

明洪武十年后建置		元建置	宋建置	地 图	方 志
梧 州	苍梧县	梧州路	梧 州	梧州府城图 梧州府治图 梧州府治图 梧州府治图	《苍梧志》
	藤 县	藤 州	藤 州	藤州府城图 藤州府治图 藤州府治图 藤州府治图	《古藤志》
	岑溪县			岑溪县境图 岑溪县治图 岑溪县治图 岑溪县治图	
	容 县	容 州	容 州	容州府城图 容州府治图 容州府治图 容州府治图	《容州志》

府	郁林州	郁林州	郁林州	郁林州郡境图 郁林州郡城图 郁林州郡城图 郁林州郡城图 郁林州郡城图 郁林州郡城图	《郁林志》
	怀集县	贺州	广州	怀集县境图 怀集县治图	《昭潭志》

梧州府二十一幅地图由于出自不同方志，因而在图式上有着不同的特点。出于《郁林志》的六幅地图留空较多，图面简洁。三幅境图中标示地名的字框有不少是倾斜的；三幅城图皆实绘城池，城外景物和地名一律不标绘，城内设施也只标出几处。出于《容州志》的四幅地图则出现了许多空白字框，一些山峰的名称也未标出，不知是原书版寝所至，还是因为改旧志为新志，更改的地名未来得及填入。这类空白字框在《苍梧境图》和《藤州境图》中也各有两处。总的看来，出于《古藤志》的五幅地图绘制较佳，《藤州城图》以□表示城墙，以□□□□表示道路。该图还将城池四周的山峰及地名绘为向城方向，与宋《宝庆四明志》的绘法相同。《岑溪县治图》与其他治图不同。该图以简朴的笔调构画出衙署布局，虽然表示建筑物仍绘出近于写实的屋宇图形，但已缩小，常见治图中的花草树木一类点缀物也未出现，已摆脱了传统建筑平面的写意情趣，更具有图示意义了。梧州府地图标示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地名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如容州诸图以回标县，以□标乡及其他地名，与宋《景定建康志》中的《皇朝建康府境之图》、元《至正金陵新志》中的《金陵山川封域总图》绘法极其相似。《藤州城图》以⊕标泉，也与明《隆庆临江府志》中的《重刊宋临江军旧城图》运用了同样的地图符号。此外，怀

集县图以凸标坛，以凹标庙，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几何符号。

燕国分野之图（卷四九〇九）

《永乐大典》卷四九〇九燕国条下有一幅题为《燕国分野之图》的历史地图，附于引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后。按是书纂于洪武十七年（1383），今存明刊残本和抄本，均无图。考《燕国分野之图》并无天文分野之意，实为表示春秋时期燕国辖地的历史地图。图中加有字框的地名多为当时的国名，未加字框的大字地名为燕郡邑名。古地名下还注有南宋州县名。与《大典》卷一〇九三五《楚地指掌之图》对照，绘式完全相同，都是出自宋程公说《春秋分纪》疆域书中。题名本为《燕地指掌之图》。

明人收是图入《大典》时，虽改易图名，但在摹绘中没有什么增删，经与现存影宋抄本《春秋分纪》对校，几无差别，惟将表示邻界的“东接海”、“南接晋”、“西接晋”、“北接狄”诸字挪到离图边框稍远的地方，显得图面更加空阔。这幅地图与后卷所引《楚地指掌之图》为我们比较《永乐大典》地图与原图的同异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太原府地图（卷五一九九）

《永乐大典》卷五一九九至五二〇五述太原府，共七卷，分目二十。这七卷都传世。首卷是地图，有二十八幅。

太原府设于明洪武元年（1368），属山西行省。明洪武间，领石、忻、代、平定、保德、岢岚六州，太原、阳曲、青阳、榆次、太谷、祁、清源、徐沟、交城、文水、孟、静乐、河曲十三县。除洪武十三年（1380）复置的河曲县以外，六州十四县并州属乐平、定襄、崞、繁峙、五台、岚、兴、宁乡八县都绘有地

图，卷首一幅为《太原府总图》。

这些地图都取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祁、徐沟、平定、乐平、忻、定襄、代、崞、繁峙、五台、兴、保德、石、宁乡十四州县图留有标四至八到的边框。诸图择取地理景物的类型大体一致，基本都描绘出了山、水、城、坛、墓、庙的位置，但在绘山、绘城、绘桥和标示庙宇、坛壝等方面稍有差异，反映了图非出于一手，很可能是杂凑诸州县方志地图而成。如城池的描绘，有的绘出了城楼，有的只绘城墙城门，有的城中地名标示很多，有的只标出县名和官署名。《太原县图》只绘出正方形的城墙，无一地名标注，似一个大的地图符号。《保德州图》将城池绘为带有月城的两个圆形，在诸城中特异。太原府地图的突出特点是运用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地图符号，如《阳曲县图》、《太原县图》、《榆次县图》、《太谷县图》、《祁县图》、《平定州图》、《忻州图》、《代州图》均以半圆形△表示坟墓，《太原县图》、《榆次县图》、《太谷县图》、《祁县图》、《交城图》、《岢岚州图》均以、表示古城，诸图还都一致地用单线表示道路。这样的标绘形式，在《大典》其他地图及现存明中晚期的方志地图中也可以看到。似明代对方志地图的绘制有着某些规定的体例，否则，从洪武到嘉靖、万历这样漫长的年代里，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方志地图竟有如此雷同的特点，其原因就难以解释了。

《大典》太原府七卷主要引录《太原志》，是书成于明洪武间。这二十八幅地图应出自《洪武太原志》。

辽州地图（卷五二四五）

《永乐大典》卷五二四五述辽州，分十七目。卷首有辽州地图二幅，无题。从内容看，应是《辽州总图》和《辽州图》。卷中有《榆社县地图》、《和顺县地图》。四图均取位上北下南。地

名的标示；古城、陵墓、驿路、城池的绘法，一如前述太原府地图，可称为“大典图例。”该卷引书除《太平寰宇记》、《元一统志》、《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等历代总志外，主要是《辽州志》和《图经志》，均为明代方志。后者多处引录《辽州志》，成书时间应稍晚。考辽州建于唐武德三年（620），几经改废，至宋元丰八年（1085）复置后方稳定下来。明以前皆辖三县，入明后，并倚郭辽山县入辽州。是图只录和顺、榆社二县，³当是明代方志地图。

潮州府地图（卷五三四三）

《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至五三四六叙述潮州府，分为二十五目。今存五三四三、五三四五两卷。

卷首有六幅地图，均无标题。第一幅绘出潮州府和潮阳、揭阳、程乡三县城池及辖域内主要司、所、寨、铺的位置。按潮州在宋元均领三县，至洪武二年（1369）增程乡县，所以这幅地图应是明代的《潮州府总图》。第二图只绘府城及四周景物，图四边标注里至多以“本县地名”相称，当为倚郭《海阳县图》。第三图是《城图》，引人注目地标写出“州治”，而不是府治，图中还绘有称为“路学”的建筑，这些称谓表明原地图的绘制时间不会晚于元代。第四图也是潮州区域总图，但辖县中缺少了明代设置的程乡县，同时，四至的标注中出现了漳州、梅州、汀州、惠州等宋代地名。（漳、汀、惠三州元代称路，明代称府，宋元梅州即明程乡县。）显然又出自宋代的《潮州总图》。第五、六两图分别是《揭阳县图》和《程乡县图》，从所标四至八到述及的地名看，又是明代建置。由上看出，潮州府地图至少是由三种方志地图辑成的。考《大典》这两卷征引的方志，主要有宋《三阳志》、元《三阳图志》、明《图经志》。《潮州府总图》及海

阳、潮阳、揭阳、程乡四县图皆有“府”的称谓，当出自明《图经志》；《城图》标有“路学”，显系元《三阳图志》的内容之一，第四幅《潮州总图》皆用南宋建置，应源自宋《三阳志》。

这些地图经明人重新摹绘，难免带有加工痕迹。如宋图中就有不少空白字框。总体说来，仍保持了各图不同的风格。出于元人之手的《城图》，以近乎写意的笔法绘出了高大的城墙和拱形的城门，凡寺、庙、司、院建筑，皆绘一小屋宇图案，这是我们在宋元版刻地图中常见的象形符号。《城图》中的道路用双线—表示，正中大街则绘成四线，以示重要，比之同时代的《重修琴川志》地图绘，更为简明，也更具图示意义。明人绘制的四幅地图，则用虚线……表示道路，同于明刻《嘉定赤城志》的绘法，如果不是明人刊刻是书时所作添改之笔，那么，明潮州府地图则是直接继承了宋人制图的某些优良传统。

汀州府地图（卷七八八九）

《永乐大典》卷七八八九至七八九五述汀州，七卷皆传世，分为三十一个子目。除“衙门”引元《江浙须知》外，其他类目都以宋《临汀志》为主要内容。这是现存《大典》中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宋代方志。

卷首有九幅地图，前三幅分别是《郡境》、《郡城》、《郡治》图，均注题于地图右上角；后六幅是属县长汀、宁化、上杭、武平、清源、莲城六县地图，无标题。汀州在宋代属福建路，绍兴三年（1133）后辖六县。从卷首地图表现的建置看，应属成书于南宋开庆年间的《临汀志》的一部分。

《临汀志》地图绘制简略，仅绘出山峰、河流、城池的位置。七幅州县境图注明四至八到，但地名标示很少。宁化、上杭、武平、清源、莲城五图只在城中标一县名，《长汀县图》稍多，也只

标出了城内的郡治及五座城门及城外的卧龙山、圆珠山八个地名。相对来看，《郡城》、《郡治》二图显得充实一些。《郡城》图以单线长方形字框标出二十六处景观，主要是城门、衙署、寺庙、仓库等设施；《郡治》图以半写意的屋宇图案标绘出山堂、镇山堂、仪门等十四处建筑。《临汀志》地图体现了典型的宋代地图风格，如以单线字框标地名，州城四面山峰绘为向城方向，山峰写实，河流绘双线等。

绍兴府地图（卷七九六三）

《永乐大典》卷七九六三至七九八三述绍兴府，有二十一卷篇幅，分为二十六目。今存首卷，有府县图、建置沿革、至到三目。

府县图包括《绍兴府八县总图》、《绍兴府四隅图》、《绍兴府公廨》、《山阴县图》、《会稽县图》、《诸暨县图》、《萧山县图》、《余姚县图》、《上虞县图》、《嵊县图》、《新昌县图》，共十一幅地图。绍兴府在宋代属两浙东路，南宋绍兴元年（1131）升府，时辖八县，元为绍兴路，属江浙行省，辖六县二州；归明后仍为府，领八县。绍兴府地图以明初八县为绘制内容，当为明代方志地图。图的绘制形式也带有明代版刻地图的特有风格。如会稽、诸暨、余姚、嵊县地图绘城墙皆成双线或四线，间描出拱形城门，不似宋代地图常见的锯齿形，这在《大典》明代方志地图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地图中都可以找到相同的例子。《绍兴府八县总图》表现诸县城池，以矩形边框中绘屋宇图案为标示，这也是明代地图常见绘法。这十一幅图都取位上北下南，但在绘山、绘城等细节上仍存在一些小的差别，《诸暨县图》、《会稽县图》将山峰绘为向城方向，异于其他县图。

从所存建置沿革、至到两类内容考见引录方志，主要是宋

《会稽志》、明《绍兴府志》。地图当摹自明志，而明府志地图应是在县志图经的基础上改绘而成的。

南宁府地图（卷八五〇六）

《永乐大典》卷八五〇六至八五一—叙南宁府，共六卷，分二十一目。今存前两卷，有府县图、建置沿革、至到、城郭、风俗形势、户口、赋税、土产八目，自山川以下十三目不传。府县图收有七幅地图，即《南宁府图》、《建武军图》、《右江之图》（两页）、《安南国图》、《宣化县图》、《武缘县图》、《横州之图》。

南宁府置于明洪武元年，时辖宣化县、武缘县、横县。宣化、武缘二县南宋时属邕州，建武军节度，故卷中引录有宋《邕州志》、《重修邕州志》和《建武志》。元至元十六年（1279）改邕州路，泰定元年（1324）又改南宁路，仍辖二县。横州降县入南宁府，是明洪武十年（1377）事，此前属浔州府。宋时直隶广南西路，辖宁浦、永定二县；元时升横州路，辖宁浦、永淳二县。《大典》卷中引有宋《横州志》和元《横州路志》。存卷中还引有两部明代方志，《南宁志》和《南宁府志》。

《永乐大典》南宁府七图当摹自上述诸志。从题目看，《南宁府图》出于明志，《建武军图》出自宋志，很清楚。《武缘县图》、《横州之图》绘式与《府图》相同，后图中还标有“横县”名，亦当出于明《南宁府志》。惟另三图绘式古朴，需细辨。《右江之图》东起上恩州、忠州，西止富州、特摩道、大理国界，为宋邕州羁縻州范围。《宋史·地理志》载，邕州辖羁縻州四十四、县五、洞一，分左江道和右江道。《安南国图》以安南城为绘写内容，是现存最早的一幅南疆图。安南国受封于南宋隆兴二年（1164），原为唐安南都护府领域，后晋时独立。北宋开宝八年（975）封其王为交趾郡王，南宋时改称安南，明永乐五年

(1407) 置交趾省。上述两图均注题于图右上角，与《建武军图》相类，表现内容又为南宋时的疆域范围，很可能是宋《邕州志》地图的一部分。宣化县在明代为南宁府倚郭，故《宣化县图》实为一幅城图。其绘式明显异于他县地图，带有浓厚的写意特征，图中画有堂、亭、厅、堤等建筑，还有许多树木衬景。似明修府志时取之旧志之图而用之。据卷中引《南宁府志》序云：洪武九年（1376）修志时，曾“起取前代应有图经志书，……将本学旧存书板一付考究。中间多有损坏缺略不存，于本处住人程士真家寻得旧有志书一部，比对刊补，完备起解。”可见当时宋元旧志尚得保存，明人曾用作修纂新志之资。

河南府地图（卷九五六一）

《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河南布政司题下收有河南府地图三十三幅。第一幅是《河南府总图》。第二至十七幅为历代洛阳城阙宫殿图，有《周王城图》、《大祀殿图》、《后汉城图》、《曹魏城阙图》、《晋城阙图》、《后魏城阙图》、《后魏华林园图》、《隋城阙图》、《隋上林西苑图》、《唐城阙图》、《唐东都苑图》、《唐上阳宫图》、《金墉城图》、《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宋城阙图》、《河南府路廨宇图》。第十八、十九幅是《河南郡邑山川图》和《嵩岳之图》。第二十至三十三幅为洛阳、新安、浥池、宜阳、永宁、嵩、孟津、偃师、巩、登封、陕州、灵宝、阌乡、虞氏十四个州县的地图。据《大典》目录，卷九五六二至九五八九述河南府，图当出自卷中所引方志。由于这些卷帙久佚于世，难窥归属。然《大典》其他韵目如岭、仓、台、湖、斋、门、堂、寺、寄中仍引有宋《河南志》二十六条、元《洛阳志》五十八条、明《河南府志》十七条、《河南府图经志》十一条。《大典》卷九五六二以下二十八卷河南府的内容应

不出这几部方志之外。

这三十三幅地图在绘写形式上明显分为两种类型。《河南府总图》及所属十四个州县的地图均注明取位、四至。县城以间距不等的三线圈成，府州城仍绘出带有门楼的锯齿形城墙，一般建筑标以屋宇符号，驿站则以方框内绘屋宇符号表示。图中出现了许多明代地图才有的几何符号。如以凸标陵墓，相似图形又见于《正德莘县志》的陵墓标示中；以☉标台，略同于罗洪先《广輿图》图例；以回表示古城，为《大典》明代地图常见绘法，也是《嘉靖钦州志》等众多明代方志地图的特有符号；其社稷坛、山川坛的标志是在方框内绘一□、∪、呂、心图案，前一符号又见于《嘉靖邵武府志》，后一图形则与《嘉靖莱芜县志》绘法相同。考这十五幅地图所述州县为明初河南府政区建置，当是明《河南府志》的卷首輿图部分。

《周王城图》以下十八图均未标出方向、里至，也无任何地名。绘式规整简明，清晰可观。城池绘以双线或锯齿形线，街道间绘单双线，水泊画出细波纹。是极为精美的城市地图。清嘉庆十五年（1810），主持全唐文馆工作的徐松曾见到这些地图，并令人摹抄了其中十四幅。据徐松考订，这些描绘历代洛阳城阙宫殿的地图源出北宋人宋敏求（字次道）所撰《河南志》。他在《唐两京城坊考》序言中说：“己巳之岁，奉诏纂辑唐文，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载，灼是次道旧帙。……”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全唐文馆摹抄本亦题《宋次道洛阳志图》。然而，徐松的考订是存在许多疑点的。第一，徐松未辑出的《河南府路廨宇图》（第十六图）与已辑出的十四图在绘写形式上别无二致，而《河南府路廨宇图》显然是出自元人手笔，对此，他未作解释。第二，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还辑有一部《河南志》，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共五十二页。前七页中缝标有“卷九五七八”，经与《永乐大典》目录核对，当

为《大典》河南府的部分内容。徐氏抄本《河南志》的后一部分叙述历代城阙古迹，自“周城古迹”至“宋城阙古迹”，分为七目，与《永乐大典》河南府地图中的十几幅古城阙迹图标题相类，说明这些地图与徐抄本《河南志》同源一处。徐氏抄本《河南志》多处述及元代事迹，显然不全是宋人作品，对此，徐松亦未作出解释。笔者以徐抄本《河南志》与现存《大典》中的二十六条宋《河南志》佚文相校，发现无一相符，然而，却有十余条文字与尚存《大典》其他韵目中的元《洛阳志》佚文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由此可见，《永乐大典》河南府地图中的历代城阙、古迹、山川部分，即《周王城图》以下十八幅地图，并非“宋次道《河南志图》”，而应是元人所作《洛阳志》的部分内容。当然，元志基本袭用宋志旧文，这已由许多学者论证。出于元《洛阳志》的这些地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材于旧志，明人在纂入《永乐大典》时又作了哪些更动，这已无法考见了，不过，从《后魏华林园图》、《河南郡邑山川图》、《嵩岳之图》所留下的许多空白字框看，肯定是经过删改的。

楚地指掌之图（卷一〇九三五）

《永乐大典》卷一〇九三五“楚国”条有一长幅地图，占两页。图右上角题“程公说分纪”，“楚地指掌之图”。程公说（1171—1207），字伯刚，南宋庆元元年（1195）进士，曾任邛州教授，后弃官研究春秋左氏之学，撰有《春秋分纪》、《左氏始终》、《通例》、《比事》等书。其《春秋分纪》仿《史记》体例，以年表、世谱、名谱、书、事、世本等目类分《左传》事迹，共九十卷。地图皆在疆域书中，计十四幅，除《楚地指掌之图》及前述《燕地（国）指掌（分野）之图》外，还有《王畿列国指掌之图》、《王畿指掌之图》、《鲁地指掌之图》、《晋地指掌

之图》、《齐地指掌之图》、《宋地指掌之图》、《卫地指掌之图》、《蔡陈地指掌之图》、《郑地指掌之图》、《曹地指掌之图》、《秦地指掌之图》、《吴地指掌之图》。

是图展现了春秋时期楚国的地理形势。图未标向，然四边皆注邻界地名，第一页标有：“东接吴”、“东北接徐鲁”、“南接吴”；第二页标有“北接陈蔡”、“西接巴地”、“西南接蛮夷地”、“南接百越地”。实取位上北下南。图中用双线绘出大江、汉江、汴水、汝水、淮水等十几条河流，以水波纹图形绘出巢湖、鄱阳湖、洞庭湖等六个湖泊，用山峰图案标出浮山、大别山、小别山、桐柏山、荆山等大小山岭。山、水、湖的名称及春秋国名圈以方字框。楚地名用大字书写，下注以宋地名，皆不加边框。图中还杂有一些文字考述，多在图下方空位处，只方城山一段居图中，特用单线圈出。

抚州府地图（卷一〇九四九）

《永乐大典》卷一〇九四九至一〇九六九述抚州府，共二十一卷，分为二十六目。今存前两卷，有建置沿革等十四目。

卷首列七图：《江西抚州府总图》、《江西抚州府城图》、《江西抚州府崇仁县之图》、《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之图》、《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之图》、《江西抚州府宜黄县之图》、《江西抚州府乐安县之图》。图皆取位上北下南，境图注四至八到。地名圈以单线边框，山峰名横写，县乡名竖写。河流绘双线，道路用单线。县图城池以双线圈成，府城则画出城墙、城楼。诸县图仅标山名，其他地名很少标出，显得图面空旷。桥梁的符号在各图中也不一致，《抚州府总图》绘成，《宜黄县图》绘成，《乐安县图》则画成象形旨意的.

图中地名反映了明初抚州府建置。卷中引录方志也以明初编

纂的《抚州府志》为主。其城池目引是志云：“郡城旧守有九门，……本朝只开四门，东曰文昌，南曰顺化，西曰武安，北曰进贤，皆重楼叠拱，高广雄壮。各门外又为外城回护。”与《府城图》所绘正相符合。地图当出自《抚州府志》。

广州府地图（卷一一九〇五）

《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五至一一九一五述广州府。这十一卷原本已佚，清光绪间，文廷式辑出前三卷。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内容包括建置沿革、道里、城池、桥梁、关津、坊里、风俗形势、气候、课利、土产十一目。卷首有十幅地图，即《广州府境之图》、《广州府南海县之图》、《广州府番禺县之图》、《广州府东莞县之图》、《广州府新会县之图》、《广州府增城县之图》、《广州府香山县之图》、《广州府清远县之图》、《连州郡境之图》、《广州府阳山县之图》。《府境之图》中标有广东布政司位置，除连州以外的八个属县为明洪武三年（1370）至十四年（1381）间广州府区划。据卷中引《图经志》及《明史·地理志》所述，洪武二年（1369），废连州，存连山、阳山二县；洪武三年（1370），又革连山县，并其地入阳山县。连州复置于洪武十四年（1381）。《府境之图》无连州，诸图中也只有连州未冠“广州府”名。标有府名的九幅地图出自明《图经志》是显而易见的。

《连州郡境之图》的特点是在图中另绘图框，图中所注四至如“东北抵临武县界”、“西北抵桂岭县界”、“东南抵含光县界”、“西南抵怀集县界”，也异于他图，未冠府名，据考是宋代县名。图中所示辖城也是宋代连州所领三县范围。考卷中引录宋代方志有《南海志》（述南海、番禺、东莞、新会、增城、香山、清远七县）和《湟川志》（述连州、阳山县）。《连州郡境之

图》当为《湟川志》中的地图。该图绘式古朴，山峰多面向州城方向，地名标示纷繁，均圈以纵横字框。出于明《图经志》的九幅地图题名一致，但图式不似一个体系。《府境之图》和番禺、新会、香山三县皆以水波纹图形表示大海，为其他县图所无。新会、增城、香山、清远、阳山五县地图绘城池采用矩形线框内画出屋字符号的形式，而其他地图则以写意笔法绘出城墙、城门和城壕。《增城县之图》未象另外八图那样以虚线绘示道路。看来，明初官修的《广州府图经志》也带有汇纂诸县方志、图经的痕迹。

附表

现存《永乐大典》地图卷目表

《永乐大典》 卷数	条 目	图 数	本文所考制图时代		
			宋	元	明
2217	泸州	5			5
2275	湖州府	11			11
2337	梧州府	21			21
4909	燕 国	1	1		
5199	太原府	28			28
5245	辽 州	4			4
5343	潮州府	6	1	1	4
7889	汀州府	9	9		
7963	绍兴府	11			11
8506	南宁府	7	3		4
9561	河南府	33		18	15
10935	楚 国	1	1		
10949	抚州府	7			7
11905	广州府	10	1		9
总 计	14	154	16	19	119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